

## “符号学研究”特辑

# 交流叙述学的认知基础<sup>\*</sup>

王委艳

(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 河南 信阳 464000)

**摘要:**进入21世纪以来,叙述学研究正面临第三次范式变革。发生在多领域的叙述转向对经典与后经典叙述学提出了挑战,赵毅衡“广义叙述学”理论框架的提出无疑顺应了这种发展趋势。面对叙述向多领域扩展,叙述的交流性得到凸显,事实上,叙述的交流性是叙述文本普遍的存在方式。交流叙述学正是在此背景下提出的。经验的社会化是人类完成自我与社会建构的基础,与意向、合作、经验共享、叙述自反性共同构成交流叙述学的认知基础,这些基础构筑了包括叙述在内的人类交流的基本模式。

**关键词:**交流叙述学;认知基础;社会化;意向性;合作;经验共享;叙述自反性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5981(2017)04-0132-05

DOI:10.13715/j.cnki.jxupss.2017.04.025

交流是人社会化的基本途径,人格独立离不开这一基本途径。也就是说,交流既可以使人类结成具有一定运行逻辑的社会集团,也是人的自我生成的先决条件。没有共同性作为背景,人的独立性就会没有支撑。同时,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经验的累积与创造使人区别于其他的动物。叙述是人经验积累与表征的重要方式之一,它融理性与感性双重经验一起成为人类最具记忆力的经验累积方式。交流叙述学的研究对象是各种学科领域中以叙述方式交流的规律与内在运行机制。无论哪个民族,其最为远古的记忆都与叙述有关。利奥塔尔把人类的知识分为科学性知识和叙述性知识。<sup>[1]29</sup>但是,科学知识也需要叙述来建构。“如果不求助于另一种知识——叙述,科学知识就无法知道也无法让人知道它是真正的知识;对科学来说,叙述是一种非知识。但没有叙述,科学将被迫自我假设,这样它将陷入它所谴责的预期理由,即预先判断。”<sup>[1]106-107</sup>也就是说,叙述是人类经验最核心的建构方式。这是交流叙述学研究最重要的认知前提。

### 一、叙述经验的累积:社会化

社会化是人类社会经验积累的途径之一,这一过程只有诉诸人类的交流才能完成。这里的经验可分为个体经验和群体经验两种,这两种经验相辅相成构成互为条件、互为基

础的经验生成过程。个体经验通过个体的社会实践、通过个体对所面对的各种自然、社会现象所形成的各种行为和思想,内化为个人化的经验并对以后的行动构成影响。个体经验建构是一个社会化过程,自我观念的形成离不开社会。米德指出,“自我,作为可成为它自身的对象的自我,本质上是一种社会结构,并且产生于社会经验。当一个自我产生之后,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为自身提供了它的社会经验,因而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完全独立的自我。但无法想象一个产生于社会经验之外的自我。当它已经产生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人在其余生中闭门独居,但他仍以自己为伴,并能同他自己思考、交谈,一如他曾同他人交流那样。”<sup>[2]125</sup>

个体通过与他人交流,通过参与社会性事物,将自己的这种经验公之于众,他人也学习他的这种经验,于是,个人经验变成群体经验并进而成为一种社会性的共享知识,这样,个体经验就完成了社会化过程而成为群体经验。这种群体经验会反过来影响个体经验的形成,也就是说,个体通过社会学习经过检验的知识,这种知识构成个人的经验基础,个体在经验基础上根据个人的实践,不断修正、创新,并将之运用于社会化实践之中,这样就形成新一轮的经验累积过程。任何符号化的经验一旦经由社会化,就会变成一种规约系统

\* 收稿日期:2017-01-19

作者简介:王委艳(1977—),男,河南内黄人,文学博士、博士后,信阳师范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当代文学理论、符号叙述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话本小说与中国17世纪通俗文学思潮研究”(项目编号:16YJC751027)的阶段性成果。

作用于任何符号主体,“规约符号的作用和效果必然是社会性的、群体性的,它的反作用力是长期的社会文化规约所设定的结果,尽管这种作用往往是符号主体所不自觉的。”<sup>[3]205</sup> 社会化既可以学习经验,也可以累积经验,它不断将个体经验和群体经验进行转化、交换,并在新的基础上进行累积。米德非常精彩地论述了这一转化过程:

当个体通过交流发现他的经验为他人所共有,即他的经验和他人的经验属于同一共相时,他便超越了只赋予他个人的东西。当这一共相的殊相或实例适合于不同的经验视界时,普遍性便呈现了社会性。可以说个体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已经超出了他的有限的世界,因为通过以经验为基础、以经验为检验的交流,他确信,在所有这些场合,世界全都呈现着同一面貌。在达到这一点的地方,经验便是社会的、共同的、分享的;只有同这一共同世界相对,个体自己的个人经验才表现出其特色。<sup>[2]23</sup>

米德的论述指出了个体经验的社会化过程,即个体经验如何转换成群体经验;同时,指出了个体经验的社会化对个体经验的独特性,即特色的抹杀,即要想使个体经验“表现出其特色”,个体必须与“共同世界”相对。笔者认为,这里的相对,不是对立,而是对共同性的警觉,是对“泯然众人”的有意识的防守。在文学领域,这种保持个体经验独特性的做法是文学的本质要求。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用“陌生化”来对抗“自动化”。<sup>[4]65</sup> 这里,自动化是一种已经社会化的经验,一种群体性经验,一种毫无新鲜感、引不起人们感觉的经验。艺术必须通过各种手法消除这种自动化带来的审美疲惫,恢复“使石头成为石头”的感觉。无疑,这种感觉是个体的,对于群体来说是新鲜的。文学的发展就是在这种自动化与陌生化的转换中进行的。布鲁姆指出,诗歌领域,前辈的经验是对诗歌的抹杀,诗歌的创新既是对前辈经验的背叛,是尽力消除他们的影响,“诗歌是对影响的焦虑,是误读,是被约束的悖理。诗歌是误解,是误释,是误联”,而“影响者,流感也——一种神秘的病症”。<sup>[5]97</sup> 由此可见,以创新为目标的文学艺术在以个体经验对抗群体经验,以个体性对抗社会化中获得一种螺旋升力。其动力基础正是来自个体经验对抗社会化而又不可避免社会化的过程之中。因为,个体经验的形成需要社会化的经验累积过程,而经验的累积又离不开个体经验的独立性。这里矛盾即是动力。人类之所以能够向前发展,关键动因是存在于人类内心的追寻真相的内在冲动,“哪怕真相很难得到,人追求真相的努力,是人类社会的生存价值所在。这并不是一个个人行为,而与社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sup>[6]9</sup> 人类经验积累就是在这种个体与社会矛盾统一中探寻“真相”的过程。

交流是个体经验获得社会化的重要途径,瑞恰兹在论及批评理论时指出,批评理论的两大支柱是“价值的记述和交流的记述”,并指出,人类的精神的根本构造主要决定于“交流”:

人类置身于交流之中已有千秋万代,交流贯穿于人类发展的过程,甚至更早。精神的大部分显著特征是由于它是交流的工具而形成的。一个经验非得形成之后才能交流,这毫

无疑;可是它采取现有的形式主要是因为它可能非得交流不可。自然选择所强调的交流能力是压倒一切的。<sup>[7]19</sup>

也就是说,人类的精神生产的目的是交流,交流促进了人类的进步,而交流能力则是在“自然选择”面前任何个体必须具有的能力。精神构造方面的交流能力表现为多种方面,并且在各种领域获得进化,这是交流的社会化的必然结果。而用叙述的方式构筑人类的精神世界即是其中之一。

叙述,作为人类经验世界的重要方式伴随人类始终。叙述经由文本化之后虽然比起日常生活精致而富于情节、因果逻辑,但这并不影响叙述与人类生活的同构关系,“如果生活至少部分是由行动组成,那么能动者就以连续的结构化插曲来经历生活,这些插曲是以目标的设定、追求、完成或放弃来划分的。”<sup>[8]48</sup> 就是说,叙述的因果逻辑并不来自叙述本身,而是来自生活,来自人类的行动。因此,从认知角度看,“‘叙事’不是一种技法,而是唯一的方式,或许应该说是自然的方式,让心灵来表征(或配置——保罗·利科会这么说)行动、欲望、变化、在世,以及人类存在的时间性。”<sup>[8]48</sup> 不过,我们必须关注另一面,即叙述技法的历史累进过程。人类的行为方式会出现不断重复,如果站在宏观角度,而非一人一事角度来看这种重复,那么这种重复就不是一种简单的历史轮回,而是一种在以往经验基础上的螺旋式重复,即后继重复不是对先前行为的简单模仿,而是吸取以往的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使自己的行为更具经验与技术含量。

叙述经验的累积同样伴随叙述的社会化过程。人类从诞生开始都在寻求经验的累积与传承方式,叙述化就是最重要的方式之一。人类早期壁画、岩画所呈现的狩猎、打仗情景,用空间和时间建构事件的内在情节逻辑,叙述化就此记录下了人类活动的一个瞬间。在文字产生之前,人类经历了长时期的口传阶段,口耳相传的远古传说记载了人类早期对于世界的理解,那种建构在时间与空间序列中的情节因果,携带了古人最为原始的对世界的掌握、理解方式。“在情节化过程中,主体意识不得不进行挑选和重组。生活经验的细节之间本是充满大量无法理解的关系,所谓‘叙述化’,即在经验中寻找‘叙述性’,就是在经验细节中寻找秩序、意义、目的,把它们编成情节,即构筑成一个具有内在意义的整体。”“一旦情节化,事件就有了一个因果-时间序列,人就能在经验的时间存在中理解自我与世界的关系。”<sup>[9]15</sup> 正因为叙述化与人类的生存经验在时间与空间序列中有相同或者相似的构筑方式,因此,用叙述的方式为人类的生存实践构筑意义才是最合理的选择。因此,叙述存在于人类的各种活动之中而不是文学的专利。

人类的任何叙述活动都会经历社会化过程,并在此过程中获得叙述技能的提升。电影叙述即是如此,电影叙述随着媒介技术的发展,一遍遍经历个体叙述技术社会化的过程,从而使电影艺术成为一种综合的艺术类型,“媒介技术的发展,使动态的、声像一体的,且可以以物理复制的影像成为可能,由此,电影得以破除语言艺术与造型艺术之间的壁垒,也使叙述和演示不再是非此即彼的。”<sup>[10]78-80</sup> 叙述的社会化既

是一个累积经验的过程,也是一个传承经验的过程;既是一个经验的创造过程,也是一个把经验历史化的过程。人类不断积累有效的叙述方式,创造新的叙述方式,不但创造叙述对象,也创造叙述方法、叙述技术和叙述手段。比如电影叙述,就是在新技术条件下的一种新的叙述方式,它使人类的叙述经验在一种全新的手段下呈N级地增长,从而扩大了人类的叙述认知。电影叙述的成长经历,真切还原了叙述的社会化过程,即电影如何通过将个体经验成功地转变为群体经验并进而催生出电影产业的勃勃生机。电影叙述的每一次技术革新都伴随着对接受市场的培养过程,即把一种新的经验快速社会化,使大众能够快速接受并形成新的消费习惯。“叙事电影的任务就是将一种反直觉的经验加以自然化,制造一种幻觉,使观众误以为得到了一扇窥视现实的特权之窗,他们期待从这扇窗户中看到的不是物体和动作,而是一个故事。”<sup>[11]490</sup>也就是说,无论采取什么样的叙述手段,最终呈现的是故事,是人类对现实的基本建构方式。

## 二、意向、合作与经验共享

以叙述的方式交流是人类的本能,因为叙述的时间和空间布局与人的生活具有相关性,或者说,人类用叙述来复制自己的生活。但在复制的过程中会加入人类对经验的有序排列。这里所谓“有序”绝非简单的时间序列,或者空间序列,还包括更为复杂的意向性。因为随着历史的发展,人们已经不能满足在简单的时间和空间中追寻事物的因果律,而是在人们对自己的行为方式的主动参与中,形成人力可为的意向性。从原始社会至今,人类的发展经历了一次次的转折。

远古人类在生产力低下、思维认识低下的情况下,时间和空间的因果律会对他们的生活起到核心作用,他们无法改变自身受时间和空间的控制局面,为食物迁徙、逐草而居、游猎等等,人的意向受到来自非人力的控制,自然的不可抗力给他们的意识造成巨大阴影,于是,自然的“神性”崇拜,对自然的妖魔化想象,如《山海经》对空间的想象是以妖魔化的畸形怪兽来表示的,这些构成远古人类一种集体的经验,并逐渐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原始的萨满、巫雉等就会形成。就是说,远古人类的意向、行为处于同一状态,他们的行为即是其意向,“野蛮人是积极行动的人:他们不是祈求神帮助他们做事,而是自己动手去做;他们宁愿念咒,而不是祈祷。简言之,他们实施巫术,尤其热衷于跳巫术舞蹈。”<sup>[12]15</sup>

当人类发展到一定阶段,意识逐渐摆脱自然时间和自然空间的束缚,走向一种人化的时空之中。即,人能够逐渐控制自己的时空观念,并且能够自由地安排自己的时空观念。人的意向性也逐渐摆脱自然控制逐渐走向自我意向。

但现在人类经过工业社会的繁荣,工具理性主导下的人类生活,似乎又进入了一种轮回。现在,人不得不进入人类自己制造的“完美”系统之中,时间和空间在这种强大的系统中被重新分割,但这种分割是将人也卷入其中,也就是说,人成了这种分割的一部分,人在这种系统中又重新回到原始人所面临的局面:人的经验被时间和空间重新建构,人被异化,自由成了奢侈品。意向性在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受

到时空观念变迁的支配。尽管意向性的变迁受到太多因素的影响,但并不能够阻碍它成为叙述交流的基础,因为,所有人都难以逃脱相同的时空背景,和由此形成的共享经验。

意向性是一切有目的行为启动的基础。塞尔将意向性做了这样的界定:“意向性是为许多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品质,即这些心理状态和事件所具有的这样一种性质,即这些心理状态或事件通过它而指向或关于或涉及世界上的对象和事态。”<sup>[13]1</sup>这里有一个核心词汇:指向性,即意有所指。

赵毅衡明确区分了心灵意向性与文本意向性,并将文本意向性作为叙述文本的分类原则。<sup>[9]23</sup>其实塞尔的心灵意向性与赵毅衡的文本意向性具有密切关系,因为任何文本的创作者在创作的时候都会进行心灵意向投射,并将之固化为文本的各种表达式,文本意向性的形成离不开这种投射。只不过,文本脱离作者,具有一定的自主性和能动性,它会进行自我意向的扩展,这不以作者的意向而转移。赵毅衡将文本意向性作为叙述文本的分类原则,因为文本意向性包含一种双重的文本定位:其一,从文本自身来说,它是文本的一种形式投射,是文本类型的体裁规定性;其二,从接受意向,或接受定位来说,它是一种“元语言”,它规定着接受的方向性。“文本意向性,是‘文本自携元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就是文本对接受者如何解释自己的要求。对于叙述文本的整体意义来说,文本意向性比单纯的情节内容更为重要。如果我们把文本意向性看成是形式问题,至少在类型意义上,形式比内容重要,体裁归类决定意义。”<sup>[9]24</sup>

综合塞尔和赵毅衡关于意向性的表述,我们可以绘制如下文本“创作-接受”的交流意向图示:



文本“创作-接受”的交流意向图示

实际上,作为一种文化规定性,体裁、文类对于任何参与交流的各方而言,其作用是一样的。以文本为中心进行的交流,会出现作者意向性、文本意向性和接受者意向性之间的交叠与错位,我们将之命名为“意向叠加”和“意向错位”。所谓“意向叠加”指上述三种意向在交流过程中会出现重合或者部分重合状态,即他们的意向性会叠加在一起,或部分叠加在一起。在交流叙述中,意向叠加使叙述在交流中效果放大,交流会出现正向效果。所谓“意向错位”指在交流过程中三种意向出现错位,有时候是大面积错位,错位面积越大会使交流效果越差,意向错位会因错位带来的多向性而减弱叙述的交流效果。正如赵毅衡所论:“一个发送主体,发出一个符号文本,给一个接收主体。发出主体在符号文本上附送了它的意图意义,符号文本携带着意义,接收者则在推演出他的解释意义。这三种意义常常不对应,但是传达过程首尾两个主体的‘充分性’,使表意过程中可以发生各种调适应变。”<sup>[14]344</sup>这里,所谓“调适应变”就是在交流中交流主体对各自交流意向的调整。但,在虚拟交流(交流某一方缺席)

中,这种调整会受到限制,其结果往往只是接受者的单方面调整,而对于缺席方而言,调整会以其他方式获得实现,有时是在历史层面,比如针对作者群体或阐释社群而言,而不直接针对个人。在真实交流叙述(交流参与各方在场)中,上述的交流意向图导向作者部分会是实线,在虚拟交流中会是虚线。但其效果不变。

其实在这个交流意向图示中,还蕴含了另一个品质:合作。在包括叙述交流的任何人类的交流中,我们不可能将交流的参与者进行单列,因为没有交流参与者的共同作用,任何参与方的单列都会减损其价值。“在交流层次上,施动者并不是第一位的:他不能被他自己所单独理解。应该一开始就把施动者设想为一个共有进程中的共同施动者”,即施动者的特征“合作性”,“合作原则确立了所有可能交流的积极规则。”<sup>[15]119-120</sup>

人作为制造和使用符号的动物,符号形成过程就是符号发出方和接收方交流合作的结果,“没有一种东西自打产生之时就是信号,信号的界定必须考虑交际的接收方。因此,当不处于同一时空时,交际发生的时空便是虚拟的,只有听话人接收到信号并且当做是信号时,也就是说,当他认为接收到的是交际行为时,虚拟才会变成现实。”<sup>[16]47</sup>在交流叙述中,无论真实交流叙述还是虚拟交流叙述,叙述文本必须在交流双方合作中完成。没有合作,任何叙述文本都不会自动成为携带意义的符号。作者在进入创作后,他第一要明确的是他的作品要表达什么?并想在接受者那里达到什么目的?而对于接受者而言,如果其接受意向与作者意向、文本意向获得一致性,那么接受就会获得好的效果,相反,则会使交流失败。因此,作者与接受者其实以交流意向为基础达成某种合作关系。“沟通者与接受者基本上靠着合作的方式交流,以传达讯息(让接受者明白沟通者的社会意图),这是两个人一致的目标。这表明沟通者会尽量用接受者能理解的方式沟通,接受者也会尽量靠着明确的推论了解对方,必要时会请对方解释清楚。”<sup>[17]57</sup>这里,合作蕴含两种行为方式:其一,行为发出方的交流行为具有明确的意向性,并以能够让别人理解的方式将自己的意向组织进一个文本(这种文本可以是能承载意向性的各种表达方式);其二,接受者须尽量以常规的方式进入交流,除非发出者文本有能够辨识的元语言来规定文本的理解方向。格莱斯对合作原则概括为四种:量、质、关系与方式,<sup>[18]26-27</sup>这里需要指出,这四种原则看似是对交流发出方的规定性,其实也同样会以另一种方式要求接收方,比如,在发出方能够以适当的量、质,并以适当的方式将交流内容组织进用于交流的文本后,接收方则不能以超出可理解范围的要求对之进行苛求,否则就会被认为缺乏合作的态度。还有另一个问题是,用于交流的文本必须考虑体裁规定性带来的压力,它对于发出方和接收方有同样的压力。事实上,符号意义在交流过程中并非是一种等量传递,而是时刻面临变化,“意义并不是时刻等待着被解释的已明晰之物。意义是在传播过程中动态生成的”,“意义的传播或交流的过程,是一种信息量之增减的过程。”<sup>[19]163</sup>

对于文学作品来说,合作是作者与接受者交流的基础:

文学作品是事前经过充分准备、考虑与选择的“言语作品”作者和读者在接触文学作品时,心里都知道并遵循合作原则和言语语境原则。在这里,作者和读者达成了一种特殊的合作契约,即假定作者保证能够提供一件有价值的语言产品,这部作品中的任何错误都会被编辑和出版商的审查加以改正;而读者则自觉地对这样有价值的作品给予认真特殊关注。<sup>[20]81</sup>

合作,对于成功的交流非常重要。在交流叙述中,不同的叙述类型和合作类型会对合作有不同要求,但上述有关合作的基础是一致的。

成功的合作还需要另一个条件,即经验共享。经验共享是人的行为方式社会化的结果。文化的传承、累积、延续之所以成为可能,与人类个体之间的合作交流密切相关。个体经验以交流的方式转变成群体经验,这种群体经验作为一种知识遗产进入传承渠道。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时刻有这种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经验的过程。“当双方有某种程度的共同记忆时,和他人交流才有可能。”<sup>[21]</sup>群体经验是一种基础性的经验体现,它是一种共享经验而成为交流的基础。“日常生活的语言充斥了许多有所指涉的表达方式,如代名词,因此彼此绝对要有共享的经验,才能了解对方用这些词时指的是什么。”<sup>[17]56</sup>一个简单的例子,当一个人身处异域,语言不通的时候,他必须采取各种方式使自己被理解,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与交流对方的共享经验太少,他的言语符号在对方身上唤不起相同的反应。正如米德所言,“对于交流来说必不可少的是,符号应当对人的自我引起它在其他个体身上引起的反应。它必须对任何处于相同情景的人具有那种普遍性。”<sup>[2]133</sup>

经验共享也是交流叙述成功的关键。交流叙述正是在经验共享的基础上使合作更有效、使作者意向性、文本意向性获得实现。同时,也正是在有效交流的基础上,人类的经验才能在“梭式循环”中获得增殖与发展。

### 三、叙述自反性

对于人类来说,自反性是认识自身、认识他人和认识客观世界的基础,没有自反性,人类就无法将自身与他人进行区分,也无法站在一个独立的角度来认识世界。“就人类来说,对自我的理解、对其他人的理解、对客观现实的理解基本上都以反身性为特点。”“自我意识的反身性来源于内心化的运用,以及话语的对话能力。在和听话人的会谈中,说话人总是第一位听众。说话人在对他人、和他人说话时,同时也在对自己说话。”<sup>[15]116-117</sup>自反性是交流的基础,任何个体在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流时,他所说的话、他的每一个动作都会在交流对方那里获得某种效果,并且,这个个体会意识到出现这种效果,他的这种“意识”就是自反性。米德指出:

在任何特定的社会动作或社会情景中,当某个体用一个姿态向另一个体指出后者要做什么时,前者意识到他自己的姿态所含的意义(或他的姿态在他自己经验中所呈现的意义),以至于他采取后者对那个姿态的态度、并且可能隐含地作出与后者明确地作出的反应同样的反应。<sup>[2]41</sup>

如果进行交流,符号必须对所有有关个体都意味着同样的东西。<sup>[2]48</sup>

这里,显然存在一个前提,即交流双方必须共享某些知识。在同一个文化环境中,大家身处其中,潜移默化,共同知识背景就会在这种耳濡目染中形成,并成为交流的共同基础。如果把眼界放在全人类,那么共同的生存模式就成为基础。虽然存在各种精神、物质差异,但那种全域性的生存世界和以生存的社会化形成的共同心理便成为一种牢固的知识。当然,跨文化交流会出现细节差异。

显然,自反性在很多时候作为一种隐含品质存在。在真实交流中,即交流双方都在场,交流的即时性使自反性和交流效果在很短时间内得到对应,如果出现对应偏差也会得到及时纠正。但在虚拟交流中,比如叙述者(作者)在场,而接受者不在场,或者接受者在场而作者不在场,这种情况下,交流效果与自反效果的对应会出现问题,而且也不会得到及时纠正。这种情况也许更为复杂,即作者也许并不为追求“交流”而进行创作,他追求的是一种自我愉悦:

艺术家通常并非自觉地注重交流,而注重的是使其作品——不论诗作还是剧本,雕像或是画作,不管它是什么——“恰到好处”,显然不会考虑它的交流功效,这一点容易说明。让作品“体现”其价值所赖以存在的真确经验才是他文思专注的主要方面,遇到困难的情况,变成为统摄一切的文思;如果他当做一个割裂开来的问题去考虑交流方面,那么由此引起的注意力分散就会在极其严肃的作品中造成毁灭性影响。<sup>[7]20</sup>

正因为这种不考虑“交流”而只关注“恰到好处”的文学创作,才使文学作品拥有创造性品质,关注个体感受,表达个体感受,并通过个体性极强的、富于个体经验的表达,才构成文学作品经验的积累与发展的动力。就是说,文学的自反性首先是以自我愉悦为交流目标的,这种有意识的标新立异使文学交流获得一种非平常品质,即新颖、陌生化快感。不考虑交流并不影响交流:

但是有意识地忽略交流毫不削弱交流作为一个方面的重要性。除非我们准备承认只有我们的自觉活动才有意义,否则就不会削弱交流。只有艺术家精神正常,使作品“恰到好处”这一过程本身便具有巨大的交流影响。

艺术家不愿把交流作为他的一个主旨来考虑。否认他在创作时由于渴望感染别人而受到影响,这并不证明交流实际上不是他的首要目标。

实际上渴望交流不同于渴望推出具有交流功效(无论怎样掩饰)的作品。<sup>[7]21</sup>

这里,文学创作自反性实际上是作为一种隐含状态存在,作家自我愉悦的过程,对作品自我体验的过程,在实际的文学接受中会得到还原,尽管这种还原会出现各种状况。

叙述,作为文学的一部分,同时也作为非文学领域的重要交流方式,也会出现上述情况。任何叙述都有一个自反过程,不管这种自反过程的目标是否为了交流,但都会在交流中显现效果。所谓叙述自反性,即叙述者在做出叙述的时

候,首先在自己内心对该叙述有个反应过程,且这一过程也是叙述者期望在接受者那里获得的。叙述自反性是保证叙述获得最佳交流效果的重要环节,如平常所说,叙述者要想打动读者首先必须打动他自己。也就是说,自我文本交流首先是自我对自身的了解,这是自我反观自身并进而以同样方式影响他人的过程。

但成功的叙述交流还需另一条件,即确保接受者能够准确领会叙述者的意图,他不但要理解叙述内容,还要理解叙述者想通过叙述内容在接受者那里获得何种反应的意图,就是说叙述内容与叙述意图同时作为叙述交流的因素,为叙述交流各方所领会。

在叙述博弈中,叙述自反性表现更为复杂。叙述者通过自反过程欲在接受者那里获得于己有利的交流效果,而接受者在理解叙述内容和意图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做出相反的反应,或者说偏离性反应。叙述交流对抗性的产生在于叙述自反性的经验并没有获得交流预期,而是得到相反或者偏移的反应。而且这种反应是建立在接受者准确理解叙述内容与意图基础上,是一种故意的反应行为。叙述博弈中的较量建立在准确理解但并未进行顺应回应的交流意图基础上。也就是说,成功的叙述博弈是以成功的叙述交流为前提,只不过这种成功的叙述交流处于潜在状态,表现出的是其反面而已。

叙述自反性是什么叙述获得成功与最佳交流效果的必备条件。叙述自反性同时也是一种能力要素,是经验的积累并获得有效运用的技能。因为,叙述者首先获得某种反应,并把这种反应通过叙述表达出来,且知道接受者会得到同样的反应。叙述自反性可通过学习积累获得较高层次,它与叙述能力相联系,可以积累、可以传承,在梭式循环链条中累进叙述经验。

#### 参考文献:

- [1] [法]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M].车槿山,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
- [2] [美]乔治·H·米德.心灵、自我与社会[M].赵月瑟,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
- [3] 彭佳.对话主义本体:皮尔斯和洛特曼符号学视域中的文化标出性理论[J].符号与传媒(11).
- [4] [俄]维·什克洛夫斯基.艺术作为手法.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C].托多罗夫,选编.蔡鸿宾,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 [5] [美]哈罗德·布鲁姆.影响的焦虑——一种诗歌理论.徐文博,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 [6] 赵毅衡.回到皮尔斯[J].符号与传媒(9).
- [7] [英]艾·阿·瑞恰慈.文学批评原理[M].杨自伍,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7.
- [8] [美]玛丽·劳尔·瑞安.故事的变身[M].张新军,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9] 赵毅衡.广义叙述学[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
- [10] 马睿.走出定式与盲点:电影符号学研究什么?[J].符号与传媒(第十三辑)2016秋季号.
- [11] 艾伦·纳德尔.第二自然、电影叙事、历史主体《俄罗斯方舟》[M]//当代叙事理论指南.詹姆斯·费伦,等编.申丹,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下转第141面)

- [3]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4] 赵世民 陈勇. 语言是歌曲的灵魂 [N]. 音乐周报 2016 - 11 - 19.
- [5] [新西兰] 罗伊·舒尔. 流行歌曲的秘密 [M]. 韦玮, 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13.
- [6] [波兰] 卓菲亚·丽萨. 论音乐的特殊性 [M]. 于润洋, 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 [7] [德] 丁达·格雷. 跨语码翻译: 歌剧唱词与配乐 [J]. 贾洪伟, 译. 语言符号学通讯 2015(4).
- [8] [法]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 普通语言学问题 [M]. 王东亮, 等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8.
- [9] [奥] 爱德华·汉斯立克. 论音乐的美 [M]. 杨业治, 译.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 [10] 马睿. 走出定式与盲点: 电影符号学研究什么 [J]. 符号与传

- 媒 2016(13).
- [11] Roman Jakobson, Selected Writings, vol. 4, Slavic Epic Studies [J]. Mouton de Gruyter, 1966.
- [12] [美] E·狄肯森. 歌曲的艺术——音乐与诗的关系 [M]. 葛林, 译.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80.
- [13] Frith, Simon. Why do songs have words? In Music for Pleasure: Essay in the Sociology of Pop [C].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 [14] Blacking, John, Music, Culture, and Experience, Selected Papers of John Blacking [C].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 [15] 海维清. 舞蹈符号学初探 [J]. 符号与传媒 2016(13).

责任编辑: 万莲姣

## A Study of the Textuality of Popular Music

LU Zheng - lan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Wanzhou, 404000; College of Literature Journalism Sichuan University Chendu Sichuan 610064, China)

**Abstract:** Popular music is a huge influence forms of art. Different from other texts, it is a multi - signifier text that composes of sound, lyrics, images, and even the singer's performance. Forming a combination of significant signs, it produces a multitude of meanings during a series of links in communication.

**Keywords:** Popular music; Multi - signifier; Combination; Textuality



(上接第 136 面)

- [12] [英] 简·艾伦·哈里森. 古代艺术与仪式 [M]. 刘宗迪,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8.
- [13] [美] 约翰·R·塞尔. 意向性——论心灵哲学 [M]. 刘叶涛, 译. 上海: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2007.
- [14] 赵毅衡. 符号学: 原理与推演 [M].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15] [法] 丹尼斯·韦尔南. 符号学研究 [M]. 曲辰, 译.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4.
- [16] [意] 布鲁诺·G·巴拉. 认知语用学: 交际的心智过程 [M]. 范振强 邱辉, 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 [17] [美] 迈克尔·托马塞洛. 人类沟通的起源 [M]. 蔡雅菁, 译. 北

- 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8] Paul Grice, 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 [M].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 [19] 赵星植. 论皮尔斯符号学中的“信息”概念 [J]. 符号与传媒 (第十三辑) 2016 秋季号.
- [20] 张瑜. 文学言语行为论研究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9.
- [21] [俄罗斯] 尤里·洛特曼. 文本运动过程——从作者到读者, 从作者到文本 [J]. 彭佳, 译. 符号与传媒 (3).

责任编辑: 万莲姣

## The Cognitive Basis of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WANG Wei - yan

(School of Literature, Xinyang Normal University, Xinyang, Henan 464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twenty - first Century, narratology research is facing the third paradigm change. In the field of narrative, it turned to the challenge of classical and post classical narratology, and Zhao Yiheng's theory of "The General Narratology" was put forward. In the face of the expansion of the narrative to many fields, 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the narrative is highlighted. In fact, the communicative nature of narrative is a common way of its existence. It is in this context that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is put forward. The experience of human socialization is to complete the self and foundation of social construction, with the intention of cooperation and sharing of experiences, and the reflexive constitute Communication Narratology cognitive basis.

**Keywords:** Communicative Narratology; Cognitive Basis; Socialization; Intentionality; Cooperation; Experience sharing; Narrative reflexivity